

ZhongGuo ChengXiang JiaTing GuDing ZiChan XuanZe

Dui JuMin XiaoFei De YingXiang YanJiu

中国城乡家庭固定资产选择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余新平◎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LY17G030012)

宁波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 (2017A10025)

宁波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培育项目 (XPYB16001)

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浙江研究基地 支持

宁波港口贸易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支持

中国城乡家庭固定资产选择 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余新平◎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乡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 余新平著.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 - 7 - 5095 - 8728 - 7

I. ①中… II. ①余… III. ①家庭 - 固定资产 - 影响 - 居民消费 - 研究 - 中国 IV. ①F12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302302 号

责任编辑: 周桂元 牛婧丽

责任印制: 张 健

封面设计: 孙丽铭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8191537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840413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4 印张 228 000 字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8728 - 7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 010 - 88190744

打击盗版举报热线: 010 - 88191661 QQ: 2242791300

摘要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的重要成就反映在家庭部门上,即居民家庭资产数量的不断增长。一方面,居民储蓄存款持续稳定增加,金融资产的种类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自 1998 年中国全面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房屋资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农村居民家庭持有农业机械的比例也在逐渐提升,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中扮演的角色也已不可忽视。这一系列变迁不仅使得以资产选择为核心的家庭金融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资产成为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变量已经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对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金融资产,还应当考虑在居民家庭资产中占比越来越高的固定资产。此外,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多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探索中国居民家庭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与消费关系的客观规律时,则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研究。鉴于此,本书在借鉴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CFPS 2010 年与 CFPS 2012 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庭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家庭固定资产选择方面。一方面,年龄、性别、教育、民族、政治面貌、健康、就业、婚姻状态、信任、医疗保险、乐观、家庭收入、流动性约束、社会互动、是否体制内家庭、家庭规模以及经济增长等因素对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和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家庭财富水平对城乡居民家庭持有或配置更多

固定资产均存在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经济知识、宗教信仰、金融发展等变量对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均不显著。

第二,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在资产效应方面,首先,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自住房屋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均存在着资产效应,且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均小于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其次,自住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在居民总样本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中均大于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但在城镇居民家庭则正好相反。在财富效应方面,除城镇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存在着微弱的财富效应外,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均不存在。

第三,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从总体上来看,中国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均显著存在。一方面,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大于房屋总资产的资产效应,但小于金融资产的资产效应;另一方面,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也小于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的财富效应不存在)。具体到农村居民家庭,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均大于农业器械固定资产。

本书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家庭资产选择。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展开,本书则以固定资产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和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拓宽了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研究的范围。

第二,关于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以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基本忽视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探讨。本书以固定资产选择为研究对象,依次考察了总样本家庭、城镇家庭以及农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从而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补充。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由于CFPS 2010年和CFPS 2012年拥有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及相关变量两期的面板数据,因此,本书在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估计时,采用了更为理想的、与差分模型估计一致的固定效应模型(当且仅当 $T=2$ 时)来进行分析。

关键词: 家庭固定资产 资产选择 资产效应 财富效应 城乡居民消费

目 录

第 1 章 绪 论	1
1.1 问题的提出	1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4
1.3 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6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7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9
2.1 基本概念界定	9
2.2 家庭资产选择理论及研究进展	14
2.3 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理论及经验研究	24
第 3 章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状况分析	33
3.1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本概况	33
3.2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状况	36
3.3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状况	43
第 4 章 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市场参与及配置程度	49
4.1 模型、数据与变量	49
4.2 估计结果	58
4.3 稳健性检验	74
4.4 本章小结	75

第5章 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76
5.1 理论基础	76
5.2 模型与变量	79
5.3 家庭房屋固定资产与城乡居民消费：资产效应	83
5.4 家庭房屋固定资产与城乡居民消费：财富效应	93
5.5 本章小结	102
第6章 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104
6.1 模型与变量	104
6.2 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与城乡居民消费：资产效应及财富效应	108
6.3 本章小结	121
第7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123
7.1 研究结论	123
7.2 政策建议	129
附录1	131
附录2	137
附录3	173
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16

第 1 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投资、消费和出口作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长期备受广泛关注。在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同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却日益显现，其主要表现为投资和出口占 GDP 比重逐渐上升，而消费占 GDP 的比重却持续下降。然而，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国际市场需求萎靡，进而导致了我国出口增速放缓与投资增长乏力。因此，转变以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已然成为保持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中国，居民消费需求长期低迷不振。一方面，与历史数据纵向比较，中国居民消费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直维持在 50% 左右，90 年代持续走低，2000 年居民消费率为 46.4%，2005 年则降到了 40% 以下，2010 年更是降至历史的最低点 34.9%，2011 年才开始略有上升。^① 另一方面，与世界各国的历史数据横向比较，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何兴强和史卫，2014）。居民消费率不仅远低于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主要欧美国家，也大大低于日本、韩国

^① 居民消费率即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此处数据根据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算整理。

等亚洲国家，同时也远低于同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陈斌开等，2010）。

关于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原因，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发展滞后的金融市场（万广华等，2001；Kuijs，2005；Aziz & Cui，2007；李涛和陈斌开，2012）、人口年龄结构（Modigliani & Cao，2004；董丽霞和赵文哲，2011；杨继军和张二震，2013）、文化习惯及家庭偏好（叶海云，2000；杭斌，2009；程令国和张晔，2011）、性别比例失衡（Wei & Zhang，2011）、户籍制度（陈斌开等，2010）和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不确定性（罗楚亮，2004；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Chamon & Prasad，2010；藏文斌等，2012；白重恩等，2012；岳爱等，2013），等等。虽然既有研究对中国居民消费不足的解释各有侧重，但另一个可能影响中国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家庭资产长期以来被严重忽视。

一般而言，家庭资产主要分为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李涛和陈斌开，2014）。其中，金融资产包括现金、存款、股票、基金、债券和金融衍生品等流动性资产；固定资产则主要包括房屋固定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①。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重要成就反映在家庭部门上，即居民家庭资产数量的不断增长，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居民储蓄存款持续稳定的增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证券、保险和国债等金融产品的发展，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空间逐渐加大，金融资产的种类日益丰富。与此同时，自1998年中国全面实施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房屋资产已经成为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②此外，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农村居民家庭持有农业机械的比例也在逐渐增长，生产性固定资产在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中扮演的角色也已不可忽视。这一系列变迁不仅使得以资产选择为核心的家庭金融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

① 本书将在第2章中对家庭资产进行定义和分类。其中，关于生产性固定资产，城镇居民家庭主要是指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农村居民家庭则不仅包括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还包括农业器械固定资产。

② 对于农村居民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将农村住房作为农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伴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建房的积极性非常高，因此，即便对于那些并未在城镇购置房产的农村居民而言，房屋资产在其家庭资产中占有的比重也在逐渐上升。

而且,资产成为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重要变量已经开始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①

然而,一方面,关于居民家庭资产选择方面的文献多以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作为研究对象(李涛,2006a、2006b;李涛,2007;陈彦斌,2008;何兴强等;2009;吴卫星等,2010;陈斌开和李涛,2011;王聪和田志存,2012;尹志超等,2014;朱光伟等,2014;尹志超等,2015)^②;另一方面,关于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相关学者以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或分析了家庭总资产与居民消费的关系(Chen et al., 2010),或对家庭金融资产和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胡永刚和郭长林,2012;Zhou et al., 2013),或是考察了房地产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黄静和屠梅曾,2009),也有对城镇居民家庭固定资产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研究(李涛和陈斌开,2014)。^③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强调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因此,对中国居民家庭资产选择行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金融资产,还应当考虑在居民家庭资产中占比越来越多的固定资产。此外,中国是一个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研究多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这无疑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但在探索中国居民家庭资产尤其是家庭固定资产与消费关系的客观规律时,则不应该再继续忽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研究。

鉴于此,本书在借鉴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④ 2010年和2012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家庭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

① 家庭资产选择方面, Campbell (2006) 首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与资产定价、公司金融等传统金融研究方向并立的一个新的独立的研究方向;李心丹等(2011)、高明和刘玉珍(2013)等国内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国内关于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中,藏旭恒(2001)最早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王江等(2010)、廖理和张学勇(2010)等学者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

② 国内相关的研究文献还包括李涛和郭杰(2009)、李涛等(2010)、雷晓燕和周月刚(2010)、吴卫星(2011)以及周铭山等(2011)的研究。

③ 第2章就居民家庭资产对消费影响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详细综述,此处文献仅为基于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部分研究。

④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组织实施的一项全国性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该项目从2010年起正式实施基线调查,至2012年已经开展了三期调查。第3章将对其予以详细介绍。

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①。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严谨规范的科学研究,以期能为优化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以及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1.2 研究的思路与框架

1.2.1 研究的思路

围绕“居民家庭资产选择及其对消费的影响”这一研究主题,借鉴既有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在充分认识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及其对消费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设计、选择和界定计量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影响因素,以及家庭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的指标及其体系,进而利用 CFPS 2010 年和 CFPS 2012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对主要研究结果进行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图见图 1.1。

1.2.2 研究的框架

根据上述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框架如下。

第 1 章为绪论。本章主要阐述本研究的选题背景,研究的目标、思路、框架、方法、数据和可能的创新及不足之处。

第 2 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本章首先对“城乡居民家庭”“家庭固定资产”和“居民消费”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随后分别对家庭资产选择理论与消费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在对居民家庭资产选择影响因素以及家庭资产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评述的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逻辑起点。

^① 关于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一方面,根据生命周期理论(Ando & Modigliani, 1963),家庭会将其持有的资产平滑地分配到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进行消费,从而实现消费的跨期优化。因此,家庭所持有的资产越多,其消费水平越高。本书借鉴李涛和陈斌开(2014)的研究,称之为“资产效应”。另一方面,根据持久收入理论(Friedman, 1957; Hall, 1978),未被预期到的资产价格上涨将会使家庭财富增加,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这种效应在文献中一般被称为“财富效应”(Campbell & Cocco, 2007; Gan, 2010)。本书随后将予以详细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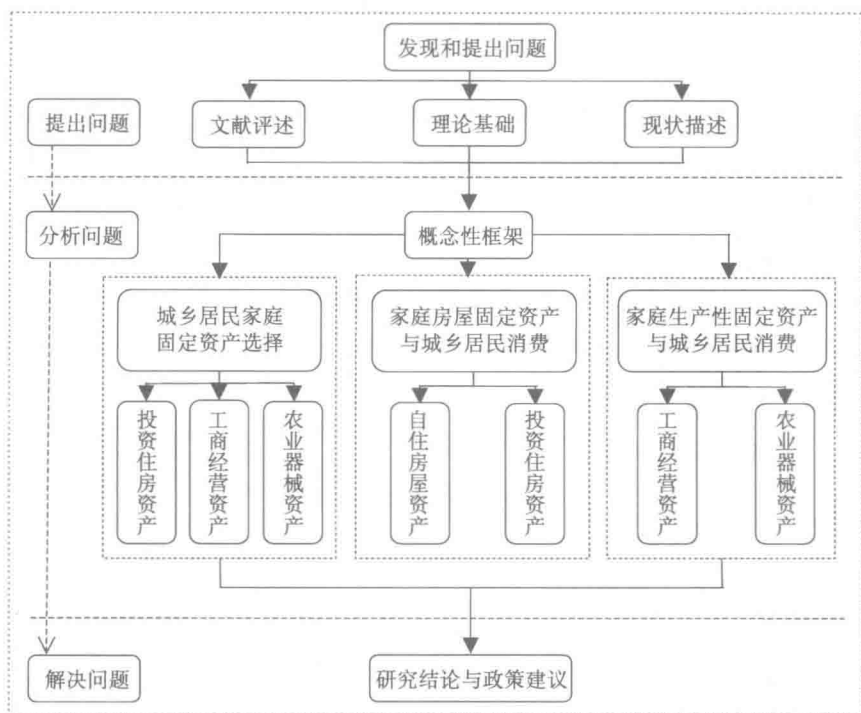


图 1.1 技术路线图

第3章为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状况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的基本概况进行了简要介绍，随后基于 CFPS 2010 年和 CFPS 2012 年的微观调查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资产与消费的状况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第4章为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市场参与及配置程度。本章主要从市场参与和资产配置程度两个方面对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和农村居民家庭农用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5章为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本章主要对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自住房屋固定资产和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

第6章为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本章首先考察了居民总样本家庭（包括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随后对农村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

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和农业器械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估计。

第7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对本书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3 研究的方法与数据

1.3.1 研究的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如下。

第一，数理经济学方法。一方面，借鉴 Muth (1960)、Olsen (1969)、Henderson 和 Ioannides (1983) 等的研究，构建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数理模型；另一方面，参考 Ljungqvist 和 Sargent (2013) 等的文献，就城乡居民固定资产选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数理分析。

第二，实证分析方法。本书实证分析主要包括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及其对消费的影响两个方面。首先，在家庭固定资产选择方面，一方面，利用面板 probit 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分析了城乡居民家庭持有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与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的影响因素问题；另一方面，利用面板 Tobit 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对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配置程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此外，利用 probit 模型和 Tobit 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居民家庭农用器械固定资产选择影响因素的问题。^① 其次，在家庭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面，分别运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识别了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房屋总资产、自住房屋固定资产以及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对居民消费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同时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城乡居民家庭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检验。

第三，比较研究方法。本书不仅对不同家庭样本（城镇居民家庭、农村居民家庭和总样本家庭）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也对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自住房屋固定资产和

^①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城乡居民家庭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配置程度影响因素的估计采用的也是 Tobit 模型。

投资性房屋固定资产)、生产性固定资产和金融资产的相关实证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

1.3.2 研究的数据

本书利用的数据来源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但以微观调查数据为主。

第一,微观数据。本书采用的微观调查数据主要来源于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①组织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该项目从2010年起正式实施基线调查,至2012年已经开展了三期调查。^②项目主要跟踪收集社区、家庭和个体三个层次的数据,其调查内容包括村/居基本情况、家庭经济、人口流动、家庭关系、居住与设施、工作与收入、婚姻、教育、健康、认知能力、态度观念和社会交往等众多主题。

第二,宏观数据。一方面,本书利用了CFPS 2010年和2012年的面板数据,因而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消费物价指数”来消除城乡居民家庭资产、消费和收入等相关变量因价格变动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本书实证模型中所需控制的“人均GDP”和“金融市场化指数”等变量的原始数据也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1.4.1 可能的创新

与既有研究相比较,本书可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方面,具体如下。

第一,关于家庭资产选择。以往的研究大多围绕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展开,本书则以“固定资产”为研究对象,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投资性房屋固定

①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ISSS)成立于2006年9月,是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的数据调查平台,也是北京大学开展中国社会问题实证研究的跨学科平台。中心承担两个大型社会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健康养老追踪调查。

② CFPS分别在2008年、2009年对北京、上海、广东三地总共2400户家庭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预调查。基线调查于2010年4月开始,2011年2月结束。2011年7月到2012年2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进行了以样本维护和测试调查为目的的小规模追访。首轮全部样本的追踪调查在2012年7月到2013年3月进行。

资产、工商业生产经营固定资产和农村居民家庭农业器械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拓宽了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研究的范围。

第二,关于家庭资产与消费关系的研究。既有文献多以城镇居民家庭为研究对象,基本忽视了对农村居民家庭的探讨。本书以“固定资产选择”为研究对象,依次考察了总样本家庭、城镇家庭以及农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和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从而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补充。

第三,研究方法方面。由于 CFPS 2010 年和 CFPS 2012 年拥有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及相关变量两期的面板数据,因此,本书在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估计时,采用了更为理想的与差分模型估计一致的固定效应模型(当且仅当 $T=2$ 时)来进行分析。

1.4.2 研究的不足

由于受到研究目标、数据资料和个人学术水平的限制,本书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对象方面。虽然本书对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包括居民总样本家庭、城镇居民家庭和农村居民家庭)相关固定资产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对居民家庭固定资产的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进行了考察,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及其对农民工消费影响的研究已变得日益重要,这将是后续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第二,实证研究方面。由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缺乏居民家庭“储蓄动机”和“信贷约束”等相关变量的数据,因此,本书并没有对城乡居民家庭房屋固定资产与生产性固定资产财富效应所存在差异的影响机制进行识别,这也是未来需要着力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评述

2.1 基本概念界定

概念的界定往往是理论或经验研究的起点。研究中国城乡居民家庭固定资产选择及其对消费影响的前提是要对相关概念进行准确的界定。本节主要从“城乡居民家庭”“家庭固定资产”和“居民家庭消费”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2.1.1 居民、家庭及城乡居民家庭

关于“居民”这一概念,《新华字典》的解释是“固定住在某一地方的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明,居民是指在某个国家或地区居住期限达一年以上者,否则即非居民。居民和非居民都包括个人、企业、非营利团体和政府四类。根据有关外汇管理法规对“居民”的解释为:居民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自然人和居民法人。居民自然人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连续居留一年或者一年以上的自然人^①,以及中国短期出国人员(在境外居留时间不满一年)、在境外留学人员、就医人员(已取得境外居留权的人员除外)及中国驻外使馆领馆、常驻国际组织使团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居民法人包括境内依法成立的企

^① 外国及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在境内的留学生、就医人员、外国驻华使馆领馆、国际组织驻华办事机构的外籍工作人员及其家属除外。

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和部队；在中国境内注册登记但未取得法人资格的组织视为居民法人；境外法人的驻华机构视为居民法人。本研究所指“居民”不包括法人居民，单指自然人居民。

家庭 (Family) 是所有社会中最核心的单元，个人的生存、种族繁衍、文化的传承以及社会的建立和秩序都需要以家庭为依据。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已经表明，家庭是文化的产物，任何国家和任何历史时期的家庭都具有时代与民族文化的特色 (丁文和徐泰玲, 2001)。费孝通 (1998) 在谈到中西方家庭的区别时指出，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但在中国却是含糊不清。一般而言，家庭是指在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基础上产生的亲属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生活单位。家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泛指人类进化不同阶段中的各种家庭利益集团 (即家族)；狭义的家庭则是指一夫一妻制构成的社会单元。本书主要考虑的是狭义的家庭概念。

西方研究中经常使用“家户” (Household) 来表示家庭的概念，一个家户即指地理上的一个居住单元，家庭结构通常是已婚夫妇与未成年子女组成的核心家庭模式，但在中国，同一地理单元上的家庭结构则存在着很高的异质性 (谢宇等, 2014)^①。相比于地理上的聚集，经济联系与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重要的家庭概念 (Thornton & Lin, 1994)。因此，本书借鉴 CFPS 的定义^②，对居民家庭的界定标准确定为“同灶吃饭”^③的“有血缘/婚姻/领养关系的直系亲属”，以及“在家连续住满三个月以上的有血缘/婚姻/领养关系的非直系亲属”。

此外，对“城乡居民家庭”概念的界定建立在对“城镇”和“农村”这两个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关于中国城乡区域的划分，《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国务院于 2008 年 7 月 12 日国函〔2008〕60 号批复) 以国务院关于市镇建制的

① 例如，一方面，子女们长大成家后可能依然与兄弟姐妹的家庭共同居住，几代人也可能长期居住在一起；另一方面，居住在同一地理单元的家庭成员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各有不同，一些可能会分为若干个小家庭，彼此之间经济独立，另一些则是一个经济共同体 (即一个生活在一起的大家庭)；此外，在中国农村地区，成年人外出打工的情况非常普遍，他们虽然是家庭经济的重要支柱力量，但却长期没有在家中居住。

② 由于本书实证部分主要采用 CFPS 数据，因此对相关概念的界定也与之基本相同，相关描述性内容也多参考基于 CFPS 数据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3》和《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4》。

③ 所谓“同灶吃饭”，实际上是经济共同体的一个通俗形象的说法。在旧时的中国，人们常用“分灶”来表示分家。这种界定方式不仅符合中国的传统，而且还可以将地理上不居住在一起但经济上紧密联系的个体纳入家庭之中，从而降低居民家庭在统计中的误差。